



2006第10期
(2007-3-28 13:56:57)

国际儒学联合会工作通报
第10期

2006年12月6日

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处编

“经典、道统与儒学的当代转型”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经以载道，道赖经传。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上，经典从来就是儒家立论的依据，道统也一直是儒学发展的宗旨。一个半世纪以来，儒学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挑战，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建构新的儒学体系，实现儒学的当代转型，便成为关系到儒学生死存亡的重大时代课题，而经典和道统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为此，国际儒学联合会于2006年10月15日在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了一次主题为“经典、道统与儒学的当代转型”的座谈会。国际儒联秘书长曹凤泉、副秘书长金美华以及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存山、张利民、邹昌林、汪学群、郭沂，北京大学的张学智，中国政法大学的单纯、林存光，中国人民大学的向世陵、彭永捷，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李祥俊，清华大学的彭国翔，中央民族大学刘成有，北京工商大学的刘东超，山东大学的蔡德贵，曲阜师范大学的崔茂新，青岛大学的冯国荣，《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魏长宝，《哲学动态》编辑部的贾红莲，中华书局的祝安顺。另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奇伟和清华大学的方朝晖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提交了论文。

曹凤泉秘书长首先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背景和国际儒联的有关情况，然后由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沂主持会议。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李景林从宏观上论述了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他从文化本身的特性及其存在、作用方式的角度，对影响文化发展的功利因素，进行了理论的分析；用“共通性”来理解文化普遍性的意义，并由这种文化的“通”性义来重新审视“全球化”的内涵，对世界文化价值方向调适和转向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指出，文化发展之“无用之用”的特性，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化走向的风云际会中，为儒学和中国文化提供了我国现代以来所未有过的契机。中国学人应理解和把握好这个契机，培育良好的文化意识，通过长期的努力，发展出现代形态的儒学，对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中华民族所应有的贡献。

刘成有一方面坦陈传统儒学在当今时代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传统儒学实现当代转型的切入点。他认为，当今时代，民主法制建设已经深入人心，宗法制的解体、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落实也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可以说，传统儒家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专制、宗法等社会环境已经颠覆，那么传统的儒家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也就是如何实现现代转型，自然就会是一个艰巨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展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与古代专制社会条件下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公共权力概念的引入。因此，对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个人满足个人私欲的合理性，就产生了新的视角。如果没有或者不是凭借手中拥有的公共权力来满足个人的私欲，无疑属于正常的人性展现，相反，如果满足个人私欲的过程中夹杂着或者充斥着公共权力的运用，无疑不具有合法性，道德评价上也应该是恶的。所以，衡量当代社会中的人性，应该放到公共权力的视野下来进行。相应的，比道德更有约束力的法律的制定，也应

该具有类似的视角。换句话说，法律的约束、制裁对象，首先应该着眼于手中拥有公共权力者的身上。如果法律制定的出发点是约束或制裁不可能运用公共权力的人，无疑是本末倒置。所以，正义与规则，应该是我们现代社会各项理论建设中关注的焦点之一。传统儒家中的“正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更重要的是，“正心”本身就蕴含着有正义与规则的内涵。这一点与现实的人的社会本质的展现，以及人性展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塑性，都是与现代工商业文明所强调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就此而言，传统儒家思想在人性方面实现现代转换，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共存共荣，并不是不可能的。

彭永捷认为，要发展儒家文化，就要重建中国文化道统。对此，他从七个方面作了论述。1、“道统”一词虽未由韩愈提出，但儒家道统思想明确提出者，当推韩氏《原道》篇。同时，道统思想可上推至孔子与孟子。2、当代面临的文化矛盾：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与《原道》一文的背景是相似的。韩愈及后来理学对这些文化矛盾的回应，对于今人仍有借鉴意义。3、《原道》篇明确将儒家文化复兴，与卫护中国文化道统联系在一起。当代儒学及整个儒家文化的发展，即当代的儒学复兴运动，必须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立国的任务结合在一起。4、当代中国文化面临再次启蒙的任务，即辩证继承五四以来启蒙思想的成果，而克服启蒙运动的片面性所造成的新愚昧——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和毁灭。5、发展儒家文化的两个向度：儒外援儒和儒内弘儒。6、从体和用 / 魂和魄两个方面建设儒家文化，即当代儒学理论建设和儒家文化体制化建设，包括儒教建设。7、在儒学理论建设方面，“出佛入老”（出入西学），“返之六经”，是历史经验。

郭沂则提出了建构第三个儒学范式的设想。他指出，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虽历经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现代新儒学等学术形态，但其基本范式可归结为二，即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的使命是建构历史上第三个儒学范式，其基本内容有三：其一，天人统与人天统一——第三范式的道统论。大道兴于对天人之际的追求。而究天人之际，则既可自上而下地“推天道以明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究人事以得天道”。由此形成了道之两统，可分别称之为天人统和人天统。此道之两统，已清晰地呈现于六经。大《易》属于天人道统，其他五经属于人天道统。孔子早期“以《诗》、《书》、《礼》、《乐》教”，主要继承了人天道统，晚年“学《易》”后，将重点转向继承和发扬天人道统。进入战国，儒家开始分化为两系。子夏、公孙尼子、孟子（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篇的作者）、《内业》、荀子承人天道统，曾子、子思、孟子则续天人道统。宋明理学的历史使命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回应佛教心性之学的严峻挑战，所以挺立思孟，提出道统学说，正是为了满足当时的现实需要。儒学能否再次崛起，关键在于它能否像当年回应佛教的挑战那样有效地回应西学的挑战，尤其是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挑战。道之另统，即人天统蕴藏着非常丰富的科学与民主的基因，是我们建构当代新儒学、回应西学挑战的宝藏。其二，五经七典——第三范式的核心经典系统。孔子和朱子分别是过去两个儒学范式的最主要的确立者，他们都将建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作为基础性工程，孔子创建了六经系统，朱子将以五经为核心的传统经学，改造为四书五经系统。按照新的道统论，儒学奠基期最重要的经典可新编为七：《论语》（附《论语》类文献）、《子思子》、《公孙尼子》、《子车子》、《内业》、《孟子》、《荀子》，总称“七典”，与五经合称“五经七典”。其三，新道论——第三范式的哲学体系。核心经典系统和道统论所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建构什么样的哲学体系，那是因人而异的。依此，郭沂尝试性地提出了“新道论”之说。

李存山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儒学转型的模式。他认为，儒家的“经典”、“道统”都含有中国文化的“常道”的思想内容。但是，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并不都是“常道”；如果都是“常道”，那就没有“儒学的当代转型”问题了。因此，我认为正确处理儒家文化的“变”与“常”的关系问题，在当前是十分重要的。按照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儒家文化中的“常道”，我们要继承和发展；而其带有落后时代特点的内容，则我们要舍弃。“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是符合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方向的。当然，只有“民主与科学”并不够，还应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道”，如“正德、利用、厚生”等等。“五四”时期的反儒与“文革”时期的反儒是不一样的。“五四”之反儒是反对北洋军阀借儒家的“纲常”来复辟帝制，“新青年”把民主与科学同儒家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他们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方法的局限。“文革”之反儒则是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其权威是法家文化和秦始皇。认清“五四”与“文革”的不同，这对于儒学的当代转型也是很重要的。

张奇伟则从儒经的变化论述了儒学转型的历史轨迹。在他看来，儒学的转型不是今日的新事，而是历史的常识。历史上，在时代的每一次变迁中，儒学必然地经历一次转型。每一次转型都自然地表现为经书和经学的变迁。因此，可以从经书和经典的历史变化看儒学的变迁和转型。孔子的“六艺”之教是经的滥觞，也是经学的开端，它清晰地昭示着孔子之儒与先前文化的文脉相系，是儒借以生成的文本资源。从此，儒学就以六经的哲学文化模式逐渐生成于世。汉初的经学与董仲舒的解经是儒学的第一次转型，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分野和终至合流是儒学内涵的整合。两宋的经解与理学的产生是儒学的第二次转型，宋学的建立，疑古疑经之风的盛行，四书集注的出现，无不在清晰地说明，

儒学由天人之学转到了天道性命之学。近代的尊经和废经的交替，现代以来经学萧瑟折射出的是儒学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实际上是儒学的一次蜕变过程。新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化热和孔子学院建立，经典的重振又一次成为儒学再生的先导，揭开了新一轮儒学转型的序幕。

汪学群也认为，儒学的转型应是儒学本身应有之义，是儒学之所以称之为儒学的关键所在。但也应注意到，儒学当代转型所遭遇的困难，正如这次会议宗旨所说的那样。他认为首先要认识儒学的当代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在这一艰难的转型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该创造出几个前提条件。第一，完整准确地把

[\[第 1 页\]](#) [\[第 2 页\]](#)

[\[关闭窗口\]](#)